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安徽

安徽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

青抗應多做些教育
工作
張勁夫



安徽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
安徽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

统一书号: 11102·71 定价: 0.85元

103651

目 录

历 史 综 述

-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张劲夫(1)
抗战时期大别山区的妇女工作……孙以瑾(11)

和 平 谈 判

- 回忆我和高敬亭谈判达成协议的经过……刘刚夫(17)
国共和谈, 结束皖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李步新(31)

动 员 民 众

- 回忆父亲朱蕴山和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朱 明(34)
抗战初期皖南地区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余纪一(45)
对安徽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
 回忆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活动……罗 平(53)
 回忆皖南“七政”青年救亡训练班……吴茂荪(58)
 我与廖鑫的关系……邓翼明(60)
 抗战初期歙县党组织的恢复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活动的开展……吴立奇(66)
 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皖南动委会……程中一(70)
 抗战初期在青阳工作的回忆……陈维稷(75)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青阳县特种工作团……………杨 刚(78)

团 结 御 侮

叶挺指挥的泾县战斗……………崔仲卿(88)

忆含城抗日保卫战……………孙国中 周道玉(96)

守蒙抗日英雄——周元……………张光国 李炳轩(105)

突击安庆日军的一次战斗……………滕唯平(108)

风 雨 同 舟

抗战初期我在安徽的一段经历……………章乃器(110)

章乃器和抗战初期的安徽财政……………许汉三(119)

周新民抗战时期在安徽的活动……………史维岫(136)

抗战初期我任舒城、无为、怀宁国民党

县长时的一些回忆……………陶若存(140)

记谢骥烈士……………刘士洪(153)

有关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概况的一份史料……………劳 章(160)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 基本过程和概况^①

张劲夫

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没有进行过集体研究与总结，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回忆，谈一点情况和看法。讲基本过程，主要是从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起到后来鄂豫皖区党委撤销止，大约二年左右时间。其中，又可分成三个阶段。开始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省工委成立到年底省工委撤销；第二阶段是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到区党委从金寨撤退至庐江东汤池；最后是区党委组织大别山党员和进步力量撤退，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桂系正式与新四军摩擦。三个阶段，都是抗战的中前期，至于中后期的情况，这里不谈。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从武汉绕道信阳前往安徽。临行前，长江局组织部刘顺元同志告诉我，安徽地下党组织已被破坏，要我去后恢复和发展组织，利用社会关系（我在上海地下党时认识一些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安徽省府在六安，我到后一个关系也找不到。后来才和李世农同志取得了联系。三月和四月初，党先后派彭

①本文根据作者四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康和谭光廷同志到六安找我，传达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由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时在舒城)，张劲夫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并在六安小东门六德公园旁租了房子作为工委机关。彭康同志带来的关系有曹云露同志(我到六安不久即见到他，但直到这时才正式接上关系)、新四军四支队民运队及兵站的同志，还有在舒城一带活动的地下党同志。工委建立，下属组织有：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黄岩(刚从延安学习回来)；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云露；舒无特委，李世农兼书记，黄育贤(桂蓬)任组织部长；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五月，省工委搬到立煌县的桃树岭(兵站所在地)。六月，日军由合肥进攻六安，占领了苏家埠、独山。工委机关又由桃树岭搬到白水河。七月，刘顺元、喻屏同志也被派来安徽参加工委。同时参加工委的还有黄岩同志、新四军四支队驻桃树岭兵站站长郑维孝同志等。这时，全国和大别山区抗日救亡的热潮已经掀起，形势很好，加上六安等县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所以党组织恢复较快。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舒无特委在八月间又分成两个特委，一个管庐江、无为等县工作，由黄岩负责，另一个管舒城、桐城等县工作，由桂蓬负责。

省工委的工作，总的说是执行中央和长江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爱国进步力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当时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爱国人士、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都有进步、中间与落后之分，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只是朴素地认为要把爱国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当时也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主要是通过动委会进行工作。动委会是当时安徽省政府官办的动员民众的组织。当时安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

安徽地方势力，一个是掌握安徽地方权力的国民党桂系，一个是国民党蒋介石嫡系。三种力量相互矛盾，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局面。安徽地方与国民党当权派竞争很激烈，国民党内部的桂系与蒋介石嫡系即CC的斗争也很尖锐。桂系想笼络地方力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进而赶走CC以独霸安徽。CC当时控制着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政府教育厅，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和省府教育厅长方治都是CC分子。桂系则控制着安徽省政府以及在安徽的军队，相继由李宗仁、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把安徽政权交给桂系是不得已、不甘心的。因此，千方百计与桂系明争暗斗。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当时首先是团结地方进步力量，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对CC则作为顽固派而与之斗争。

我们团结地方进步人士、联合桂系反对CC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争取群众尤其是青年问题上，集中表现在利用动委会这个组织来团结爱国青年，发动群众。当时桂系迫于抗战形势，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安徽站稳脚跟，不得不借助地方进步力量，成立了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动委会这个形式，山西有，叫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李宗仁在徐州也搞，叫战地民众动员委员会。李宗仁虽兼任动委会主任，但他不管事，开完成立会就到前线去了，日常工作由委员兼秘书章乃器代拆代行。章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被蒋介石逮捕过，是党发动群众斗争迫使国民党释放的。这次桂系邀请他来主持动委会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了省财政厅厅长，都是为了显示桂系与蒋介石不同，连七君子也敢用。动委会委员有省府各厅处负责人和地方开明进步人士。开明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有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四位老先生，他们德高望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

当时，朱蕴山任动委会总务部长，管经费；沈子修任组织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长；只有一个情报部长，由投靠桂系的原十九路军将领丘国珍担任。四位老先生和章乃器都是党的同情分子，党在动委会中有地下党的支部组织，各部都有党的小组，直接与我联系。各部中层力量大多是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如总务部的总干事童汉璋，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这时虽脱了党，但后来又根据地来了；组织部总干事周新民是秘密党员，与董老直接联系，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安徽，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党员。那时我以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名义作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可能知道我的身份，因此，他用人主要尊重我的意见，凡是我提出的意见，他都赞成，经过与几位老先生商量后贯彻下去，在组织部起的作用很大；宣传部总干事先是翟宗文，同情党，后是狄超白，是章乃器介绍来的，原是上海地下党员，后来恢复了党籍；后勤部总干事为朱子帆。主任干事大多是地下党员。干事中也有不少是党员。宣传部中有朱凡、胡竺冰（当时为进步人士，后来入党）、翟宗文（后来当宣传部副部长）。后勤部主任干事史谦是地下党员。这样，在四位老先生之下，有周新民、童汉璋、朱子帆、胡竺冰、翟宗文，又有狄超白、朱凡、许晴、史谦、汪胜文等。实质上是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通过动委会这种组织形式，推动全省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地下党还利用动委会名义，办了一个训练班，在一处山沟（彭家湾）古庙中，由詹运生（地下党员）负责，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从以上情况看，动委会也可以看成是实际上在地下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统战组织。

动委会在省内各地组织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抗敌协会，还在高庙办了妇女训练班，并在各县成立了县动

委会，经费由省动委会发给。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由省动委会派指导员任专职副主委，掌握实际权力。这些指导员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少数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是靠工作团。当时省动委会派到各县的工作团有四十多个，还组织了十几个委托工作团，共有一千多人。工作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发十几元生活费；地下党员大部分在工作团中，以团为单位成立支部，有的直接与我联系，有的与各地特委、县委联系。个别团内没有党员，但也尊重省动委会地下党的领导。总之，省动委会从组织上、经济上控制了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此外，我们还成立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简称妇战团)，由孙以瑾同志任支书(第一任支书是胡晓风)，蒋岱燕任团长；还有少年抗日宣传队(吴道明同志负责)等组织。在上述的工作团、妇战团、少宣队中，除安徽本地青年外，有从江苏流亡来的爱国进步青年，如扬州、常州等地来的江上青、金涛等同志；有文化界流亡人士，如在舒城的柳乃夫、李竹平等同志；有浙江来的刘保罗、俞仲武等同志；有上海来的陈穆等同志；从皖南来的陈国栋等同志；还有延安抗大、山东党组织派来的冯纪新等同志以及天津、北平的流亡学生等一大批人。他们当中，经组织介绍的党员，我们都分到各工作团当团长和县动委会当指导员，或派往动委会办的及桂系省政府举办的干训班当队长和指导员。有些党员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被派到章乃器的财政厅及各地货物检查处(税收机关)工作。这个时期，群众发动得相当快，宣传动员工作十分活跃，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组织群众锄汉奸、支援前线抗战部队。从省到县，整个宣传工作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国民党嫡系吃不开。方治办了一个《皖报》，我们就推动桂系办了个针锋相对的《大

别山日报》，并派去几个地下党员当编辑。《大别山日报》社长是桂系派的，但总编辑靠近我们党，有一个副刊由我们主办。我们还开办“生活书店”分店，公开发行进步书刊。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武汉出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当时在大别山区广为传播，连广西军队内部也有人阅读。总之，党在动委会的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团结了群众，团结了当地爱国力量，团结了桂系内部的进步人士，争取了桂系和地方进步力量共同与顽固派作斗争，打击了CC的气焰，使其难以捣乱，不能插手动委会工作。CC想抓权，结果只抓了几个临时中学。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迁到重庆，原来由其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安徽省工委，在组织形式上已不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长江局根据中央精神，决定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领导湖北省东北部、河南省东南部以及安徽省西部的工作。何伟同志在十月份以新华社记者身分由湖北来到立煌，传达了长江局的这个决定。但区党委正式成立则在一九三八年年底郑位三、郭述申同志到立煌之后，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的一、二月份。郑位三任书记，何伟任常委、组织部长，彭康任常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任常委、民运部长，谭希林（延安派来）任常委、军事部长。为了便于工作，区党委民运部下面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少景）、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孙以瑾），宣传部下面成立文委（书记朱凡）。这三个党内机构，运用省动委会的公开合法组织开展工作。由于我在动委会内有合法身份，所以文委的许多工作也是和我联系较多。广西军队和“广西学生军”内部的工作和桂系省府内地下党的工作，也是直接和我

发生联系的。同省工委相比，区党委委员增加了很多，有方毅、黄岩、冯纪新、周晓乐(豫东南特委书记)、郑维孝、程坦等。区党委由中原局领导，中原局书记为刘少奇(化名胡服)，组织部长为朱理治(化名皇岗)，机关设在河南确山新四军八团留守处。中原局对区党委的指示，电台联系较多，有时也派秘密交通来。至于区党委给中央和中原局的书面报告，位三同志在时有一些，内容记不清了。附带说一下，在工委时，彭康同志关于曹云露的问题给中央写过报告。曹云露同志运用桂系皖北行署合法关系来搞武装是正确的，但坚持原则不够，犯了一些错误。后来调到鄂东北特委工作。这位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有功劳的，后来在反摩擦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区党委成立时，日军已占领了淮南路，于是我们又以淮南路为界，在路东成立了皖东省工委(或省委)，成员有刘顺元、方毅、李世农、谭光廷、喻屏等，负责开辟敌后工作。路西的大别山区这时仍是桂系势力范围，不是敌占区。因此，区党委在淮南路西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争取抗日爱国力量，发展党组织，在桂系内部发展地下党组织。至于发展武装，只是在无为、庐江、桐城沿江靠近敌占区的游击区做了一些工作，发展不快。当时组建的武装，后来编为江北游击纵队，这是由无为等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的，由新四军军部孙仲德同志任司令员(孙原与曹云露一起在合肥一带打游击，到延安学习后调到新四军军部)；有方毅、张体学在湖北黄冈组织的五大队；有桂林栖(黄梅县委书记)组织的八大队(成立不久即被顽固派打垮了)；有程坦同志领导的七里坪留守处的少数留守队及河南的同志在铁路上组织的铁路工人游击队。五大队及程坦同志的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五师的基础，而江北游击纵队加上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的少数部队，后来发展为七

师。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年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七月份，中央和中原局来电指示，估计桂系也会跟着反共，应该将大别山区地下党和进步力量转移到皖东和皖东北新四军活动地区内。区党委机关也要转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区党委在白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退。七月二十四日，区党委四名常委郑位三、彭康、谭希林、张劲夫开始分两批从立煌白水河转移到庐江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住在一起；另一名常委何伟同志以新四军参议和新四军驻立煌办事主任的公开身份，暂时留在立煌部署其他同志的撤退工作。九月份，区党委在东汤池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主要是选举七大代表。何伟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并决定将鄂东北、豫东南工作交给李先念同志领导，又派李丰平同志去立煌，成立立煌市委，领导地下工作。李丰平同志任市委书记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以后桂系公开反共，来不及撤到庐江，就同电台一道北撤到彭雪枫的六支队。总起来说，这次撤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九四〇年春，桂系公开反共，我们的同志已基本撤完，包括四十多个工作团、广西学生军和桂系军队内的地下党员和靠近党的爱国青年，以及省干训班、省府各厅的一大批进步人士在内，总数达三千人。其中，仅桐城县就将近有五百人撤到解放区。留下的少数同志如詹运生、史谦等，后来因组织被破坏而被桂系活埋了。转移到根据地的同志则有的成为淮南、苏北、皖东北根据地地方工作的干部，有的参加军队，充实了部队干部力量。

上面说的，大致说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

程和概况。这个基本过程说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一九三八年，成绩是主要的，动委会、工作团，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当然，问题也有。概括地说：（1）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2）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是运用动委会这个合法组织，从而团结了广大群众，进行了抗日；（3）工作偏重城镇，偏重知识分子，宣传教育多，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工作抓得不力（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抓住日军进攻六安时，在六安、合肥一带放手发展武装，失去了一次有利时机），主要是争取民主人士，在桂系内部做争取工作，并帮助地方上一部分爱国人士组织了一部分自卫大队武装。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新四军四支队主力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中央通知我们向主力靠拢。我们去了，参加了少奇同志召开的座谈会，听了他的分析，才明白在前一时期工作中，我们没有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敌占区去放手发展革命武装，以我为主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有教训的。少奇同志在座谈中指出，抗日要有枪杆子，要有武装，要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家，靠讨饭吃，怎么抗日？不要什么都经过统一战线，都要国民党批准，难道他们不批准就不抗日了吗？蒋介石在庐山说过：“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既然抗日人人有责，我们就不应该缩手缩脚，他不同意，我们就自己委派司令、委派县长，一切为了抗日嘛！少奇同志这么一说，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应该早一点把大部分力量放到敌占区和敌后去，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创立根据地，而不是在桂系势力范围内建立政权，那样做是要打内仗的，抗战是不能打内仗的。但在敌占区、在敌后这样做，我们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里附带讲一下有的工作团帮助地方建立保甲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应当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对于当时反对敌人、汉奸破坏，不能说有错，而且乡政干部训练班，绝大部分人员是党派去的。从总体上看建立保甲在当时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没有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敌后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上。可以说这是主要教训。

一九四〇年一月，成立路西省委(彭康任书记)、路东省委(张劲夫任书记，二月份张调新四军五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书记由方毅担任，后由刘顺元同志担任)。三月份，桂系军队进攻，自卫还击战开始了。当时，四支队在路西，五支队在路东。我们部队少，桂系则来了好几个团，东边还有韩德勤的部队，怎么办？我们针锋相对，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自卫还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路东来安县据守半塔集，罗炳辉等同志则带主力去路西会同四支队主力在大桥、藕塘、得胜集一带首先把桂系军队击退，站住了脚。接着又回师把路东的韩德勤赶走。半塔保卫战是新四军战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战役，领导和指挥这次战役的有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徐海东等同志。我也参加了。由于反击胜利，四月上旬，路东、路西两块根据地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次桂系进攻，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党的对策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不仅建立起来站住了脚，而且在巩固中不断发展。

抗战时期大别山区的妇女工作

孙以瑾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党促成国民党桂系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并在各县成立县动委会。桂系同意建立这些群众性组织，既是为了标榜抗日，更是为了对抗安徽国民党CC派。他们企图利用动委会培养一批青年干部，让他们担当区、乡、保、甲基层的行政工作，以壮大桂系的实力，巩固日趋溃散的安徽基层政权。中共安徽省工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不失时机地抽调一批党的干部进到动委会这一合法组织里去工作，并组织了省、县动委会所属的六、七十个工作团以及三十个委托工作团。省、县级动委会和工作团的领导人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党的同情者。各工作团一面学习，一面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同时发展党的组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别山地区的妇女工作也活跃起来了。除省、县动委会、工作团有女同志外，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三十五工作团(全部是女青年)、安徽省妇女训练班都是专门培养训练妇女干部的阵地。在这些抗日组织中学习、工作的大批女青年，逐渐成长为抗日活动的战士，其中有不少人都加入了共产党。下面，我谈谈这些抗日妇女组织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春，来自皖北、皖中各地的流亡妇女，云集

在六安，准备成立第五战区安徽省妇女救国会。为此，曾开过两次座谈会，出席的有桂系安徽省政府、省动委会、五路军第十一集团军、省动委会所属工作团、安徽各县流动工作队、六安小学教职员（其中有国民党员及无党派人士）等单位的妇女代表。我党的地下党员有蒋岱燕（在十一集团军）和我（在省动委会后勤部），并有靠近我们的吴哨林（在省各县流动工作队）、姚毓慧、田浩德（在省保安处）参加。会上，因为良莠不齐，为了筹备会人选问题发生了争论。这是我们党的妇女干部与五路军代表、国民党代表第一次交锋。结果，我们取得了妇女工作的领导权。不久，因六安沦陷，人员转移，统一的妇女组织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大别山区的妇女工作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仍在蓬勃发展。

一九三九年春，金寨县成为敌后大别山地区的政治中心，先后建立起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有些县也成立了妇女救国组织，这就需要党来加强领导。鄂豫皖区党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就是这时诞生的。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同志通知我们：区党委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由陈景文（在鄂东，一直未到金寨县来）、刘芳、李静一、易凤英和我组成，我负责妇委工作。为组织日常工作还设立了常委会，由我、刘芳、李静一负责。我们虽然年轻，经验不足，但革命热情极高，都决心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妇委通过省动委会这个合法组织，建立省、县级妇女工作机构，培养妇女干部。在省、县动委会内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工会），负责领导公开的妇女工作，并决定省妇工会由广西学生军二中队指导员朱澄霞（中共党员）任总干事。她是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所信任的干部。桂系省政府民政厅长陈良佐（曾代理过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的智囊，解放后是广西的爱国民主人